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王东 李孝迁 / 主编

「德」伯伦汉 / 著 陈韬 / 译

胡昌智 李孝迁 /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学方法论

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

中国现代史学评论

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

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

近代中国史家学记

史学方法论

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

英国文化史

陈啸汪史学论文集

刘挾黎史学论著集

中国古代史学评论

京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

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

历史综合法

海外借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王东 李孝迁 / 主编

史学方法论

「德」伯伦汉 / 著

陈 韬 / 译

胡昌智 李孝迁 /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方法论 / (德) 伯伦汉著; 陈韬译; 胡昌智, 李孝迁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1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ISBN 978-7-5325-8960-9

I. ①史… II. ①伯… ②陈… ③胡… ④李… III. ①史学—方法论 IV. ①K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4903 号

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史学方法论

伯伦汉 著

陈 韬 译

胡昌智 李孝迁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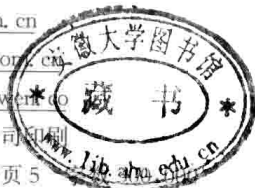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5 插页 5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960-9

K·2533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丛刊缘起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新史料、新视野和新方法，而新史料则尤为关键。就史学而言，世人尝谓无史料便无史学。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无独有偶，陈寅恪亦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顺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王、陈二氏所言，实为至论。抚今追昔，中国史学之发达，每每与新史料的发现有着内在联系。举凡学术领域之开拓、学术热点之生成，乃至学术风气之转移、研究方法之创新，往往均缘起于新史料之发现。职是之故，丛刊之编辑，即旨在为中国近代史学史学科向纵深推进，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持。

当下的数字化技术为发掘新史料提供了捷径。晚近以来大量文献数据库的推陈出新，中西文报刊图书资料的影印和数字化，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近代学人文集、书信、日记不断影印整理出版，凡此种种，都注定这个时代将是一个史料大发现的年代。我们有幸处在一个图书资讯极度发达的年代，当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绝好机遇，做出更好的研究业绩。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大多关注史家生平及其著作，所用材料以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期刊文献为主，研究主题和视野均有很大的局限。如果放宽学术视野，把史学作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互相联络，那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所凭借的资料将甚为丰富，且对其也有更为立体动态的观察，而不仅就史论史。令人遗憾的是，近代史学文献资料尚未有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从而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之一。适值数字化时代，我们有志于从事这项为人作嫁衣裳的事业，推出《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计划陆续出版各种文献资料，以饗学界同仁。

丛刊收录文献的原则：其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丛刊以发掘新史料为主，尤其是中西文报刊以及档案资料；其二“应有尽有，应无尽无”，丛刊并非常见文献的大杂烩，在文献搜集的广度和深度上，力求涸泽而渔，为研究者提供一份全新的资料，使之具有长久的学术价值。我们立志让丛刊成为相关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这项资料整理工作，涉及面极广，非凭一手一足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便可期而成，必待众缘，发挥集体作业的优势，方能集腋成裘，形成规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有着长久深厚的学术传统，素为海内外所共识。我们有责任，也有雄心和耐心为本学科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在当下的学术评价机制中，这些努力或许不被认可，然为学术自身计，不较一时得失，同仁仍勉力为之。

欢迎学界同道的批评！

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及其在东亚的知识旅行

——代前言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弥漫着“科学主义”思潮,所有学术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才能为人所接受,故而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开始提上了日程。自从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语文考据学方法,经过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治史程序。在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之下,急需将这些方法加以充分解释,整理成有系统的方法论教材,以便训练专业史学工作者有所凭借。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 1850—1942)率先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1889, 下文简称 *Lehrbuch*),此后不断增订再版,在西方各种史法教材中影响最大,诚如齐思和所言,此书为历史方法开山之作,亦为此学最高之权威,在此之前关于历史方法之作皆属片段未具系统,后乎此书者无不受其影响,且亦难出其范围,诚史学中最重要之著作也。^① 伯氏史学曾对中国现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但中文世界对他的认识略有不足:第一,过去谈伯氏,都笼统地认为他是兰克史学的代表,对他史学思想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第二,过去对伯氏史学方法著作常混为一谈,往往都看成是《史学方法论》,对各种版本修订情况语焉不详;第三,过去对伯氏史学在日本、中国史界影响的具体历史细节并不清楚。因此,本文将用四节讨论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及其在东

* 本文第一至第三节由德国华裔学者胡昌智教授执笔,第四节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教授执笔。

①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73 页。

亚的知识旅行。首先,叙述伯伦汉的生平,将他放回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背景中。历史背景包括政治面: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德国建国,成熟时期的威廉帝国与老来迫害他的纳粹政权,以及学术面:科学主义与唯心史学之间的激荡,尤其是延续十余年、有史学界以及哲学界、社会科学界参与的史学论战;其次,说明《史学方法论》的版本与分析版本之间的修订。藉着增修内容的分析,期望读者一方面可以了解伯伦汉提出的方法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见到他个人的情绪波动;再次,尝试评论伯氏的史学方法,从史学史以及史学理论的角度说明他在史料学上的成就,以及他的历史解释方法学的局限;最后,勾勒伯伦汉史学在近代日本、中国的接受情形。

一、伯伦汉的生平

恩司特·伯伦汉 1850 年出生在德国汉堡市的一个海外贸易商家庭。父亲路易司·伯伦汉及母亲伊玛都是犹太裔,隶属自由派的犹太革新教会圣殿会所,与保守派的犹太社群保持着距离。伯伦汉一家代表当时积极融入德国社会的犹太人。伯伦汉在一个开放的汉萨城市以及开明的犹太家庭中成长。十二岁时,他进入以人文教育为主轴的约翰诺恩(Johanneum)中学。这所 1529 年成立的约翰诺恩中学,几百年来一直是汉堡市市民阶级富裕人家子弟的教育机构。他在这所中学里习得了人文教育核心的拉丁文与希腊文。现代语方面,他通晓了法文与英文。而且就在中学期间,在他母亲伊玛影响之下,伯伦汉立志当史学家。^①

① 追述伯伦汉的生平首度出现在 1950 年战后汉堡市《历史与乡土》(*Geschichte und Heimatsblatt*)期刊,1942 年过世时,因为犹太裔的身份他的行传没有依例出现在报刊上。1955 年的《新德国传记》(*Neue Deutsche Biographie*)年刊将他收入,由 Gottfried Opitz 执笔,有半页篇幅。1961 年 Herbert Schönebaum 发表《兰普瑞希特与伯伦汉》(*Karl Lamprecht und Ernst Bernheim*)其中有传记部分。1988 年 Notker Hammerstein 编《1900 年前后的德国历史学》其中没有提及伯伦汉。1971—1982 年 H. U. Wehler 编九册《德国史学家》其中也没有伯伦汉。直到 2009 年 Knut Langewand 撰写小书《历史主义中的历史知识理论:伯伦汉的历史哲学与史学方法》(*Historik im Historismus: 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historische Methode bei Ernst Bernhei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9),才有比较详尽的传记。2012 年 Mircea Ogrin 的《恩司特·伯伦汉:帝国与魏玛共和国期间的史学家及学术政治家》(*Ernst Bernheim 1850—1942 Historiker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er im Kaiserreich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2012)最为完善。伯伦汉个人资料及手稿由格莱斯瓦德大学哲学学院档案室保存管理。

1868年伯伦汉进入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尚未完成建国,普鲁士国王在俾斯麦相佐之下,正积极地进行以战争推动统一的工作,而且目标明确地要将奥匈帝国排除在未来的国家之外。^①当时柏林除了是新兴军事强权普鲁士王国的首府,而且也是新兴的历史学重镇。伯伦汉上了史学大师兰克的课,也听了朵伊森的历史导论课。^②1870年普鲁士与法国宣战,他请缨上战场,但因为眼疾未被接受。1872年他决定离开柏林,转校到建国后创立的史特拉斯堡(Strassburg)帝国大学。这所位于德国西南角新成立的帝国大学有许多现代特质:自然科学学科独立成为一个学院,不再像在传统大学里隶属于哲学学院之下。^③历史学科也独立成为一个系(Seminar),不再与语言学、哲学、国家学、地理学等课程混杂在一起,新聘任的教师明显的都比较年轻,而且有实证主义的新倾向。

伯伦汉离开柏林大学是否因为历史系里或大学里或柏林城市里有反犹的气氛不得而知。^④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柏林大学没有与兰克、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或其他教授建立紧密的师徒关系。^⑤相对的,在史特拉斯堡帝国大学里,他立即遇到了两位与其亲近并长期照

① 普鲁士王室不接受以1848年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以立宪整合各邦的统一建国工作。德国最后以武力建国的方式与氛围陪伴着伯伦汉成长以及他的一生:一位有世界公民取向的犹太裔学者置身在强烈民族主义的国家中。

② 2012年Ogrin的研究修正了1998年Schleier所说:伯伦汉在柏林没有听过朵伊森的课。Ogrin指出伯伦汉在柏林大学这段时间朵伊森每年有开历史理论课程。根据伯伦汉亲手填写的资料,他从1868年春到1871年春在柏林大学,之间于1869年夏季班一个学期前往海德堡大学。1872年春前往史特拉斯堡大学。次年博士毕业。伯伦汉档案PA卷。

③ 伯伦汉任教于格莱斯瓦德大学期间自然科学与历史系属于同一个学院——哲学学院。一直到1952年,在东德时期,自然科学才从哲学学院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学院。德国各大学学院调整步调不一。

④ 著名的反犹史家Heinrich Treitschke次年1873年才进入柏林大学接任兰克退休所空出的讲席。

⑤ 这样看法可以从他1880年的小书《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Salzwasser Verlag, Göttingen, 1880)得到印证,书中他将兰克与朵伊森列为与实证主义取向历史研究对立的唯心史学派,他强调两派都显示片面性。这样与兰克、朵伊森保持着距离的态度,说明了他柏林没有投入大师门下的意愿。在1889年《史学方法论》中他认为兰克有空前的成就,但是已过时(1903年版*Lehrbuch*,第214页);有关朵伊森作品的十五行文字也在平实冷淡中略带贬抑。他说朵伊森的书对历史方法学“点到但未加说明”(andeutend aber nicht erklärend)(1903年版*Lehrbuch*,第221页)。Ernst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Duncker und Humblot, Leipzig, 1903.

顾着他的教授：①一位是参与建校工作，学官两栖的法学教授阿特赫夫；②另外一位是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魏兹瑟克。③

1873年伯伦汉在魏兹瑟克指导下完成中古时期宗教、政治与法制史的论文。在《洛塔三世与沃尔姆合约》(*Lothar III. und das Wormser Concordat*)为主题的论文里，他讨论1133年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洛塔三世如何解释帝国与教皇之间1122年签订的合约，并从中争取帝国的权力。刚毕业，魏兹瑟克立即将新科博士伯伦汉推荐给创立哥廷根大学历史系(1848)的大师威次，④请他把伯伦汉收入门下，并担任其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研究与写作的指导教师。在威次指导下，伯伦汉的教授资格论文主题也是中古史。他从法律与宪法发展的线索分析教会与君主之间的权力冲突。1875年他顺利完成这篇论文，通过考试，获得了申请全德国地区教授职位的资格。在申请到正式教授职位之前，他以待业教授的身份(Privatdozent)留在哥廷根大学开课。

伯伦汉从1875年开始在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开课，一直到1883年获得正式教职离开哥廷根为止，总共八年；他一直开历史学导论以及历史方法学两门课。这期间有三件事值得特别提出。第一件事，兰普瑞希特(Karl Lamprecht)在1876年冬季班上了伯伦汉的历史学导论课，受了启发，后来走上了与传统唯心史学完全不同的一个史学新方向。他不再视政治菁英的活动为历史发展的轴心，而以群众的经济活动、集

① 当年有两位学生入学进入该校历史系。格莱斯瓦德大学1902年哲学院中历史、语言、哲学三系共有一百名学生，包括全院入学的25名新生。当时全校618名学生，到1919年全校有2190名学生增加三倍多。德国大学学生从1900年后人数激增，原因包括1908年起女性入学。

② Friedrich Althoff(1839—190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普鲁士大学改革者。1872年参与史特拉斯堡大学建校工作，1882年进入普鲁士宗教、教育、医学事务部担任处长。次年伯伦汉的教授申请获得他的协助。

③ Julius Weizsäcker(1828—1889)，兰克的学生，中古史史家，受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委托编纂德意志帝国议会档早期的部分，其中有关Ruprecht国王(1400—1410)的三册由他转交付伯伦汉。第三册伯伦汉于1888年在格莱斯瓦德才完成。1896年伯伦汉撰写恩师行传，细数建校时期感人的轶事，刊于*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d. 41, Leipzig, pp. 637—645.

④ Georg Waitz(1813—1886)在尼布尔及兰克的影响下由法律转入史学，在柏林大学先跟随兰克，后投入历史法学派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门下。经兰克推荐参与《日耳曼历史纪录》(*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中古史料编纂工作。1848年后在哥廷根大学建立所谓的哥廷根学派。

体心理现象、文化表现为研究对象,而且用量化的方法处理与这些现象相关的资料,进而追求历史发展的规律。1878年兰氏转校到莱比锡大学跟随经济史专家若谢(Georg Friedrich Wilhelm Roscher),但一直与伯伦汉保持密切联系,并受到他的支持。^①十三年后,成为教授的兰氏在1891年出版代表新史学方向的《德国史》十三册中的第一册。这本书在仍然充满政治史、人物传记研究的史学界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备受攻击。兰氏在他的《德国史》里提及启蒙的伯伦汉,因此后者被视为是与兰氏一伙的实证主义史家。

第二件事,魏兹瑟克在1876年交付伯伦汉编纂神圣罗马帝国议会1400到1410年档案的工作,亦即是收集整理卢普瑞希国王当选帝国皇帝前后与各选侯、大主教及意大利金主城市之间关系的资料。帝国议会档案的编纂工作是兰克1858年召集成立,由巴伐利亚科学院的历史委员会秘书长瞿贝尔主导,^②目的是整理、收集日耳曼民族的历史资料。近古部分第一册收集的是1376到1387年间帝国议会的相关资料,由魏兹瑟克在1867年完成并出版。伯伦汉以待业教授的身份肩负这项工作,一方面是种殊荣,另一方面也补贴了待业期间的经济收入。学术上,因为他前往布拉格、汉诺威、威尼斯、佛罗伦萨、卢卡、罗马等地阅读档案,筛选、比对、考证、抄录、编纂与帝国议会相关的资料,进一步提升了其中古史资料的见识与史料学的能力。

伯伦汉在哥廷根时期第三件值得提出的事是:1880年他出版了《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这本一百三十八页的小书是他授课三年的一个结晶。他感受到欧洲当时有两个对立的历史研究潮流,一个是唯心主义哲学潮流下的历史研究,另一个是社会主义与自然科学潮流下的历史研究。前者的哲学思想从康德、斐希特经黑格尔一脉相承而落实在兰克、朵伊森、特莱契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等的德国历史主义史家的历史研究中。后者的哲学思想源自法国的康多塞、孔德,而落

① 参见上引Orgin书,第31—32页。

② 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是兰克的学生(1834—1838),1856创立巴伐利亚大学历史系,1859年创刊德国史学界第一份学术期刊《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替历史主义唯心史学建立大本营。

实在英国的巴克尔以及尚未成名的年轻兰普瑞希特的历史研究上。^①他在这本小书里也提出具有折衷立场的一个方向：以哥廷根的当代哲学家洛策(Rudolf Hermann Lotze)微宇宙观为基础，他认为人类史可以与自然史整合为一，而且可以同时摘取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长处。

从学术血统而言，伯伦汉是标准的兰克的第二代弟子，跟随两位兰克的亲炙弟子魏兹瑟克以及威次完成学术论文，而且参与兰克与瞿贝尔的德国中古史档案编纂工作。然而，年轻的伯伦汉成长的时代已经不是兰克及朵伊森成长时的农业与阶层社会，而且他也能从档案堆中探出头首，综观当时史学研究在急速工业化时代里的处境。同时，他能超越德文出版的界限，进入英国以及法国另一种学术传统中，注意到孔德对社会及学术研究的取向。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历史方法学的反省中表现出对历史学广大的视野，能够察觉到同时兴起的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与历史学的关系。他个人广大的视野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冲击，一方面，他个人必须尝试跳出在传统考证与唯心史学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他必须面对“背叛”传统史学受到的鞅伐。^②显然这位待业准教授所受到的压力远远超过仅作为一位考证史学家所承受的。

当年史特拉斯堡大学的法律系教授阿特赫夫，1880年起任职普鲁士邦文化部处长，负责督导高等教育。在他的协助下，1883年伯伦汉终于获得该邦格莱斯瓦德(Greifswald)大学的教授职位，距离通过教授资格考试正好八年。格莱斯瓦德大学创立于1456年，独立的历史系

① 这两个潮流明显地表现在朵伊森1863年所发表批判英国史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的书评中。这篇刊登在《史学杂志》代表历史主义阵营的书评，它面对的是法国哲学家孔德思想影响下的实证主义史学以及模仿自然科学的史学趋势。这个趋势在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翻译成德文(1859年)后，在德国造成风潮。生理学家杜伯雷(Emile du Bois-Reymond)当时的柏林大学科学院数学与自然组秘书长、柏林大学校长，他以巴克尔信徒身份宣扬这个实证科学的历史研究。朵伊森书评的中译参见胡昌智：《译介朵伊森书评〈提升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刊于《台大历史学报》2013年第51期，第182—221页。

② 1880年他出版的小书表达出对实证主义研究的赞赏，但又无法畅所欲言。参见胡昌智：《译介朵伊森书评〈提升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译序。根据《史学方法论》几个版本修改增添的线索，他努力在长期的方法论论战中澄清学界对他的误解。他不断引述唯心派新出版的历史知识论，论述实证主义史学追求历史法则的不当，但是又同时强调孔德以及唯物主义史学有可取之处。伯伦汉在论战中被论战对立两派所排斥，他是论战的边缘人，也自认为是论战敌对立场的超越者。笔者分析《史学方法论》各版本增添与修改显示：没有阵营的归属感是长期的心理状态。

成立于1863年,在这两方面,它都具有全德国先驱者的角色。伯伦汉在系里讲授他专长的欧洲中古史以及历史方法学课程。格莱斯瓦德城市邻近波罗的海,离汉堡不甚远,城市虽小,但是建筑风格与商业带来的自由气息都与故乡汉堡类似。伯伦汉在生活与工作上都觉得稳定及舒畅。1886年与同样是祖籍汉堡的阿玛丽·耶森(Amalie Henriette Jessen)女士结婚。婚前,伯伦汉改宗,加入了阿玛丽所属的基督新教。此举一方面完成了他的老师魏兹瑟克为了他的职业生涯一直期望他改宗的心愿,另一方面,延续了他父祖辈逐渐接受德国市民阶级生活方式的趋势,正式脱离了犹太教。伯伦汉婚后的新家是学校同事经常聚会的场所。^① 教学之余,1888年他完成了1400年到1410年《神圣罗马帝国议会资料汇编》第三册。^② 次年,我们中文世界所熟知的《史学方法论》出版,该书德文的全名是《历史方法教科书:附加历史学程中最重要的史料与辅助科学引介》。^③ 这本书是他教史学导论以及史学方法十二年的结晶。他撰写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历史系的学生对历史学科有整体的看法,以及让他们从事历史研究时有可资遵守的规则。这本书融合了他本身长期所致力之中古史史料考证心得,^④以及他所见到十九世纪末新学科——国民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兴起,这本书也呈现他在唯心史学与实证史学的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

《史学方法论》这本书在西方历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先驱者的地位:当传统的历史研究逐渐成为现代的历史学科时,在这个蜕化的过程中,方法学的出现代表着学术规范的建立;而最具有全面性的规范、最有系统

① 根据每年出版的大学课程手册所登记的教师资料,伯伦汉住 Brink 街 71 号。该门号今(1925 年以后)已不存在。格莱斯瓦德城市 1965 年为纪念伯伦汉而颁发的纪念门牌镶嵌在 Arndt 街 26 号。根据 Knut Langewand (2009) 所述,家中常有音乐会的聚会,参见上引 Langewand 书,第 75 页。

② 这三巨册资料汇编充分显示伯伦汉是位熟悉拉丁文及中古德文孜孜矻矻的文献考证学者。《史学方法论》中的史料分类与考证步骤建立在他长年中古史扎实的实作基础上。

③ 1903 年版书名加上“与历史哲学”,成为《历史方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附加历史学程所需的重要史料与辅助科学引介》。

④ 伯伦汉在格莱斯瓦德大学几乎每年开两门课,一门史料考证以及一门中古史专题。史料考证课每星期一、二、四、五,早上 8 点到 9 点,共四小时。专题课星期六 8 点到 10 点。长年如此。考证是他研究与教学的重点而所用的材料都是中古史范围的材料。伯伦汉档案 PA。

的整理就在伯伦汉 1889 年出版的这本书里。^① 他从历史研究的对象到史料的定义与分类,以及史料的各种考证方法与解释,如何综合叙述,都先后有序地进行了细密的解说。在学生的教学上,也就是说,在未来新一代历史研究者的培训上,从此历史学科有了一个统一而严谨的步骤。

1889 年《史学方法论》出版之前,伯伦汉就在他给兰普瑞希特的私人信函中充分表达对历史研究新方向的肯定。他支持历史学以经济生活、法律演变、社会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走向广义的文化史研究,正如兰氏所要呈现德国中古时代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面貌。在《史学方法论》里,这个研究方向的合理性被默默地安置在各个章节中。譬如在历史研究对象的定义上,他的定义就包含了群众的经济生活与心理状态。因此,《史学方法论》的出版没有获得传统政治史阵营的肯定。当时许多位传统唯心历史主义史学大师仍健在,他们的学生遍布在各大大学,占据重要职位,加上 1870 年德国建国带来的狂热政治风潮,使得政治史研究仍然笼罩着史学界。而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显然有从根本的历史现象定义上向传统历史研究权威挑战的态势。新兰克学派学者连兹(Max Lenz)对新出版的《史学方法论》做简短的反应。他在 1890 年的书评里说:“伯伦汉书里那些所谓的方法,对史家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把那些平凡无奇的工作讲成理论,其实都是多余的;史家该专注在叙事工夫上。”^②连兹代表普遍敌视方法学的立场,他以简洁的文字浇了伯伦汉一头冷水:建立历史学方法论的工作根本是无的放矢。历史主义阵营此时没有人深入、具体地讨论这本新书,譬如讨论这本书与历史主义大师朵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之间的关系,或者讨论伯氏所精通的考证方法与史料分类与考证大师尼布尔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是历

① Horst Blanke 将历史主义分为三个阶段:思想萌芽时期、古典时期、理论反省与史学专业化。在第三阶段中历史主义在政治、学术组织与学术理论都完全制度化。Blanke 认为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就代表历史主义史学理论在历史学专业化过程中落在在制式的方法上。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比法国 Charles-Victor Langlois 和 Charles Seignobos 合著的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1897, 下文简称 *Introduction*) 要早出版八年。*Introduction* 于 1926 年由李思纯翻译为中文,书名《史学原论》,参见本文第四节。

② 有关 Max Lenz 的评论参见上引 Ogrin 书,第 45—46 页。强调群众生活的期刊《文化史研究》1905 年第三次刊行之后有篇简短肯定的书评,参见 Georg Steinhausen,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3. u. 4. Aufl.,”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Bd. 3, 1905, pp. 235—237.

史主义阵营对他的“冷处理”，^①忽略他，不讨论他。

1891年兰普瑞希特出版从广义文化史角度撰写的《德国史》第一册，在史学界投下了震撼弹。德国的第一份学术期刊《史学杂志》主编瞿贝尔鼓励年轻学者贝娄(Georg Below)撰文鞅伐兰氏，巨细靡遗的长篇负面评论开启了史学界的方法学论战。^②1895年曼乃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继瞿贝尔担任主编，也持续着以整个期刊的力量进行论战。在学界中伯伦汉被归类为实证主义文化史学派阵营史家。^③1893年贝娄批判兰氏的同时，也因此指责伯伦汉在其四年前出版的《史学方法论》叙述唯心史家的部分太过简略，而且对尼布尔的叙述出自剽窃。^④

1895年伯伦汉申请转校，希望前往兰普瑞希特任教的莱比锡大学历史系。他的申请广受莱比锡大学同仁的欢迎。在校方送往萨克森邦政府文化部的三人推荐名单中，伯氏名列第一，而且从资历、学术研究、教学能力以及与师生相处融洽能力各方面，他的评语都极为正面。然而，文化部圈选了排名第二的塞立格(Gerhard Seeliger)。伯伦汉申请转校失败原因不易确定，是否政府中有反犹情结或兰氏从中作梗，研究伯氏的学者各有揣测。不争的事实是：1895年之后，伯伦汉与兰氏双方几乎没有书信往来，之后偶尔的往来也互称“您”，以尊敬营造距离，这样的关系也显示在1903年《史学方法论》修订版中，其中许多增添的论述及批判明显是针对兰氏而发。^⑤

延续十余年激烈的方法论论战，1903年伯伦汉在第二度修订的

① “冷处理”这个词是曼乃克作为历史主义传统史学堡垒的《史学杂志》主编对待兰普瑞希特1903年所使用的话，他不同意在《史学杂志》上刊登连兹批判兰氏《德国史》的长篇书评，以免炒热读者对对方的兴趣，以及提升对方的身价。笔者认为这个概念也适用于表达正统史学阵营对待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态度。

② Georg von Below 评论 *Über Deutsche Geschichte I - III* 刊于《史学杂志》1893年第71期，第465—498页。三十四页长篇书评没有讨论兰普瑞希特历史解释的观点，他只从考证角度批评该书文字欠简炼与精确，指出书中许多不确定的事实，也批评该书材料配置不佳，政治史不足。

③ 1895年前伯伦汉与兰普瑞希特的亲密往来，参见 Herbert Schönebaum, *Karl Lamprecht und Ernst Bernheim*，刊于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Bd. 43, 1961, pp. 217—239.

④ 为此毁谤式的批评，伯伦汉考虑走法律的途径控告贝娄，为此他向老师阿特赫夫请教。有关贝娄多次在书评中对伯伦汉作品表达轻贬之意，以及两人间的冲突，参见上引 Ogrin 书，第51—57页。

⑤ 此论点将在本文第二节详细说明。

《史学方法论》中,留下清楚的痕迹。其中,他努力澄清学术立场,并且强烈抨击兰氏。伯氏重申自己的立场:历史研究要注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以及彼此的关系,但是不能模仿自然科学追求定则。针对兰氏,伯氏肯定他扩大历史研究的视野,但不同意他将德国史划分为九个历史发展阶段,更不能接受各阶段转换机制中有其规律。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兰氏自认为是新研究取向的创始人,无视孔德以来的实证传统。兰氏的自大而且对伯伦汉 1880 年出版的论述视而不见,着实伤了伯氏的心。^①

笔者认为两人的疏离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个性与学术立场的差异,与莱比锡大学转校失败无关:在激烈的论战中,兰氏立场鲜明,他坚持历史发展有社会集体心理的规律,而且他自信建立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是他自发而且首创的,并非跟随或承续法国孔德哲学而衍生。他是头角峥嵘的斗士,自视极高,喜好论战,乐在其中,当他从唯心史学的大本营柏林大学吸收到几位跟随他作博士论文的学生时,他因而兴高采烈。兰氏适合这样的斗争。然而个性温和的伯伦汉在方法学上明显采取折衷的立场。他一方面深深感觉到传统历史主义史学的局限,感觉到战争史、人物思想史、政治史无法在工业化的社会、群众力量浮现的社会里继续让人信服。同时,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接受着重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历史研究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在历史中追寻定则,他认为历史学不该骥附于自然科学的特质上。因此,他不甘被论战者界定为相敌对的任何一派。他相信他追求的是超越唯心与实证的、更高层次的历史研究。他相信他调和的努力,能呈现未来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即使如此,伯伦汉在 1903 年版的《史学方法论》对兰氏激情的批判,显然已经有超出纯粹学术立场差异的因素,而包含了私人的情绪。^②

1895 年莱比锡教职申请失利,并没有影响伯伦汉在格莱斯瓦德大学的人望。当年,他接任哲学学院院长职位,负责学校四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与哲学学院)之一的行政工作。1900 年他更被推举为格莱斯瓦德大学校长。作为一个校长,他所面对的是急速的工业化

① 此论点将在本文第二节详细说明。

② 同上。

带来教育变革的时代。高等科技专校、高等商业专校纷纷成立。传统大学与它们之间的分际必须厘清。同时,1890年之后学生人数激增:1902年学校有学生618人,较十二年前(1890年)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到了1919年,学生人数更高达2190人,是十七年前的三倍。大学不再是十九世纪初年威廉·洪宝德提出大学理念时的状态,它不再是两三百名贵族、牧师与上层市民子弟的菁英教育自由游学场所。因此,大学的入学条件、授课课程、考试方式,甚至教育目标都需要重新界定。为了让全国各邦的大学能有效而且一致的面对这些变迁,伯伦汉推动成立德国大学校长联合会议,这个会议持续发展到今天已成为重要的正式的机构。同时,为了面对高等教育的变革,他也推动成立专业的高等教育学系,把高等教育当成一个研究的课题,而且成立全国性高等教育学学会。在他担任校长期间,他展现新构想,创立国民大学(类似社区大学)的民间教育组织。现今这类大学也推广成为德国全国性的普遍机构。伯伦汉是十足的教育家,他有远见、有创意,即使他的学术作品《史学方法论》也充满着教育性质,它其实也是为历史系新生的教学而写作,它是有学术深度的教材。1909年卸下担任了九年的校长职位之后,他又回到哲学学院担任院长。

伯伦汉在校长任期中完成了一件普及历史学方法论的重要出版工作。1905年他应葛申出版社之请,在丛书计划之下将原本写给历史系学生以及专业同仁阅读的《史学方法论》,改写成给一般民众阅读的《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05,下文简称*Einleitung*)手册。^①这个类似商务书局人人文库的葛申丛书,有不同的知识系列,历史系列也在其中。伯伦汉配合葛申丛书简洁与广面的宗旨,在巴掌大小共156页的《历史学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强调,这本手册本之于1903年版的《史学方法论》以简明易解为首要目的,读者若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可以参考《史学方法论》。事实上,这本手册的章节上就是《史学方法论》章节的重组。手册全书只有三章,第一章“历史学的本质与任务”即是《史学方法论》的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章

① 葛申出版书商(Götschensche Verlagsbuchhandlung)是十九世纪柏林莱比锡古典书籍出版社,普及科学的《葛申丛书》创于1889年。

“历史学的工作领域”以鸟瞰式的说明辅助科学及史籍的分类：编年史、世界史、地方史、类书等，它出自《史学方法论》第三章第三节。该书真正的重点是第三章“研究工作的方法”。在这里，伯氏将《史学方法论》的第二、三、四、五、六章的内容简化融入，而明显地，史料学的分类、考证学、史料的解释被凸显出来。除了章节重组的变化以外，这本手册与《史学方法论》最大的不同在它的叙述方式。它舍弃《史学方法论》中辩论式的叙述，而采用直述的方式。学界的不同意见不再是伯伦汉要引述、质问、肯定或驳斥的对象。在直述的文字中因此不再有方法学论战带来的激情。^①同时，《史学方法论》中大量的引文、脚注全都在手册中消失。比起《史学方法论》，这本简易的手册因此显得额外顺畅及具有可读性。

伯伦汉在葛申丛书历史学系列中的这本《历史学导论》广受喜爱，1907、1909年以及1912年分别重印一次。它不只广受德国国内读者喜爱，而且在国际上它的流传即使面对《史学方法论》也不遑相让。1920年伯氏七十岁时，出版了修订增添的第二版。刚退休的他还亲自替1922年日文译本写序言。^②

1914年欧战爆发，德国举国欢欣地迎接这场战争。伯伦汉的三个儿子一起从军。小儿子在医疗单位服务，两位兄长都上了前线。两人先后负伤，荣耀的退出战场。然而战争在军民无预期中忽然以投降结束，威廉帝国瓦解，接着缔结了屈辱的凡尔赛合约。举国哗然中，检讨投降的原因，谣传最广的说法是犹太人在国内出卖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制造内部分裂，这是所谓的“背后一刀”论。犹太裔的伯伦汉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说法，他婉转的表示：社会内部不合是战败的主要原因。

1920年伯伦汉正式从任职三十八年的格莱斯瓦德大学退休。除了仍然担任高等教育学学会主席之外，他卸下一切正式职位。1933年纳粹执政后，他走入了艰难的老年岁月。德国的反犹思想从中古以来的文化取向变成了全然的血缘决定论。1933年“净化运动”就开始在

① 伯伦汉在 *Lehrbuch* 显现的激情参见本文第二节。

② *Einleitung* 与 *Lehrbuch* 在日本与中国的流传参见本文第四节。